

古代中国与东南亚 宗教关系研究

程爱勤 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

古代中国与东南亚 宗教关系研究

程爱勤 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古代中国与东南亚宗教关系研究/程爱勤著.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10. 9

ISBN 978 - 7 - 5348 - 3446 - 2

I. ①古… II. ①程… III. ①中外关系 - 宗教史: 国际关系史 - 研究 - 东南亚 - 古代 IV. ①B929.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88011 号

责任编辑: 张向敏

责任校对: 孙 波

出版社: 中州古籍出版社

(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发行单位: 新华书店

承印单位: 河南大美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张: 15. 75

字数: 215 千字 印数: 1 - 1000 册

版次: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5. 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程愛勤著

古代中國與東南亞
宗教关系研究

八旬老人程榮生題

本书由教育部省属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河
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与河北大学历史学强势特色学科学术
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目 录

前言	(1)
1 西汉时期南海中西航线之我见	(8)
2 论汉魏时期中国与东南亚交往的宗教动因	(35)
3 论两晋时期扶南国与中国交往的文化动因	(78)
4 从刘宋王朝的视角论其与扶南王国交往的宗教因素	(96)
5 从扶南王国的视角论其与刘宋王朝交往的佛教因素	(119)
6 论萧梁王朝与东南亚地区交往之宗教本质	(138)
7 由“郑和下西洋”论中国与东南亚佛教关系的转变	(177)
8 论公元7世纪前华人向东南亚移动的特点	(192)
9 论公元7世纪前移向东南亚华人群体的构成	(216)
10 论公元7世纪以前华人向东南亚移动的状态	(231)
后记	(241)

前 言

如何为本书“命名”，是笔者面临的第一个问题。自从近代欧洲文化进入中国以后，以其治史方式为基础蓝本，国人亦著作了许多有关中外关系的论述，所使用的名称也十分繁多，诸如交涉、交通、交往、交流、流通、往来、外交、友好、交好、通事、朝觐、聘问、外事、邦交，等等，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这些词的使用并没有实质上的区别。随着近几十年世界文化事业的迅速发展，考虑到有些词汇已经过于偏生，如“聘问”等；有些具有不平等色彩，如“朝觐”等；还有一些词汇已经被界定有了某种特定的含义，不容再混合使用了，如“交通”，就常常被定性在与交通工具、道路桥梁及相关技术方面，“交涉”则极易与各种带有非友好色彩的外交谈判混为一谈，“友好”自然就会限定在某些特定意义上的行为，“流通”基本上已经成为物资交换的专用词了，而现代意义上的“外交”，是在欧洲近代处理国际关系过程中形成的。它的一般是指：“国家以和平手段行使主权的活动。”^①很显然，这与笔者所要研究的古代中国与东南亚地区间所产生的宗教交往行为有着不小的差别。

^① 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政治学》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外交》，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电子版。

笔者最后决定采用“关系”一词来定性该课题，主要目的在于想表明将要进行的相关论述是在讲述一些客观存在的事物或事件，而并不想刻意地去表现某种思想、规范某些行为，更不想给我们所论述到的行为加以某种“是”与“非”的标准。

总之，笔者觉得，“关系”一词最不易产生歧义而又能涵盖所有论述内容的最佳选择，它符合我们“尊重历史，阐述历史，总结历史”的最基本的著述出发点。

毋庸置疑，对外关系，“是我国古代王朝统治事务的重要组成部分”，^①亦是我們透视中国古代封建政权统治的重要窗口。虽然目前国内有些涉及东南亚历史和文化的研究课题目标与它有相近或相似之处，也有一些著述偶尔论及到这方面的问题，但从研究的时间段、对象、方法、目的、内容和材料等方面都与我们设计的课题有较大的不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它基本上还算是一个新的研究课题，或者说是一个用较新的角度来研究的课题。

当然，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所谓的“新”，并不是说该课题所涉及的所有问题都是前人没有研究过或涉及过的。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有了众多的相关研究成果，有些还是非常卓越的，我们才有可能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换言之，笔者实际上是在综合了诸多研究者的已有成果基础之上，从笔者的角度，用笔者的观点，对已有的和新发现的史料，进行尽可能全面的综合分析、阐释我们的研究课题。

就已经有的资料和研究成果而言，现在要勾勒出一个“古代中国与东南亚宗教关系史”基本清晰的发展脉络，应该不是一个特别困难的事情。但要搞清楚一些关键问题，特别是要进行一些理论性的概括总结，还需要进行大量的研究工作。资料的缺乏是一方面，缺乏指导性的理论

① 祝总斌：《汉唐外交制度史·序一》，文载黎虎：《汉唐外交制度史》，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1页。

上是更为重要的方面。两千年的中国与东南亚交往本身就带有明显的特殊性，其中有地域的、文化的、宗教的和政治的等诸方面。如双方关系的“定性”就是学术界一直没有统一的老问题。仅就“朝贡”行为的性质就不知有多少文章参与了讨论，至今仍未有一个令人满意的、一致的意见。古代中国与东南亚的宗教交往，从许多方面来观察，都可以说是一个独具特色的时期。从中国方面是这样，从东南亚方面也是这样，从宗教的角度更为明显。

笔者进行该课题研究，并不仅仅是想搞清楚这个历史时期的某个史实真相，而是想搞清楚，导致该时期中国与东南亚发生交往行为的更深层的社会或文化原因。当然，交往既然是社会性的，原因必然也是社会性的，而社会性也就意味着综合性，经济的、物质的、军事的、政治的、文化的、地域的、民族的、自然的，等等，都可以是展开研究的角度。

笔者在十余年的研究学习过程中，总是感觉到在公元7世纪前中国与东南亚交往行为的大量外在表象后面，有一种看不见的东西在起作用，这就是笔者将要展开讨论的宗教意识。笔者觉得，在公元7世纪前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交往过程中，中方的宗教需要一直是相当强烈的，有时甚至起着支配中方的交往行为的作用。所以，笔者就想努力搞清楚，宗教理念或宗教需求在这个时期对中国与东南亚地区交往的发生与发展过程中，到底起的是什么样的作用？是从属于政治和经济交流的副产品，还是相对独立发展的主流产品？甚至是以宗教交往为龙头而引带来其它交往行为？

虽然大多数学者发表的有关研究成果，并没有明确提出这个时期的双方宗教交往行为，是附属于政治或贸易交往之下的东西，是派生的东西，但从他们论述问题的字里行间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其理论倾向是这样的。

不仅在国内学术界如此，在国外研究界“用国际海上贸易的扩大来

解释”^① 该时期中国与东南亚交往的观点，也曾经是获得最多响应、得到最普遍赞同的观点。贸易，这一近代资本主义赖以扩充发展的基本交往手段，被推而广之地应用到了前资本主义的国家关系或地区关系的研究之中。

7 世纪之前东南亚地区佛教的发展状况是笔者探讨的另一主要内容。笔者将在非常有限的篇幅内努力将婆罗门教、大乘佛教、小乘佛教、印度教在东南亚地区的演变、转化过程搞得比较清晰。搞清楚该时期东南亚政府对佛教的态度，更有助于我们认识这些政权对南朝交往的基本政策出发点是什么？政府对这种交往过程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东南亚地区又是如何利用宗教来发展与中国的关系的？这种宗教关系的维持能给东南亚地区带来什么样的实际利益？简而言之，宗教交往在南朝政府官方与东南亚地区官方交往的过程中究竟是一种结果还是一种原因？是一种手段还是一种目的？

传统的国内学者常常认为，公元 7 世纪之前的中国统治者维持与东南亚交往的主要目的，是出于政治上的考量，是为了满足统治者的大国欲望的表现，是为了炫耀国威，同时也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奢侈消费。

进入近代以来，在西方“社会发展决定于经济发展”研究模式的影响下，许多研究者（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又纷纷将经济的目的列为此时期中国与东南亚地区（似乎还不仅仅限于此时期和东南亚地区）交往的主要促成原因，仿佛促进经济发展和物质交流成了全部行为的目的或动因，不计其数的著述将古代中国与外国“朝贡”型的交往，不分阶段地统归于“朝贡贸易”类型。经济因素在这些论述中成了几乎唯一的原因。

实际上，“研究南方文化，离不开与其周邻地区文化的比较，特别是

^① [澳大利亚] A·L·巴沙姆主编：《印度文化史》，（闵光沛、陶笑虹、庄万友、周柏青等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年 11 月版，第 654 页。

与其生态环境相似、民族成分相似的东南亚地区的比较。就东南亚地区而言，这一地区包括越南、泰国、老挝、柬埔寨、马来西亚以及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从铜器时代至铁器时代初期，中国南方与东南亚的文化交流，曾经给双方文化的发展都带来了积极的影响，谱写了一首又一首各民族友好相处的赞歌”。^①

在本课题的研究中，探索宗教对7世纪之前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的影响，是主要目的。如上所述，前人已有的有关研究成果，多将目光集中在诸如经济的、政权的、军事的、物质的需求之上，而较少地注意到宗教需求。即使有谈到宗教需求者，也常常将其作为上面诸种需求的副产品。我们从大量的古代中国与东南亚交往的资料中，看到宗教的或与宗教有关的内容，要远远超出非宗教的或与宗教无关的内容，这使我们感觉到有必要对宗教需求在该时期双方交往中所起作用进行一番探讨。同时，该时期正是佛教在中国从无到有，再到第一个繁盛期的阶段。而东南亚地区则是深受古印度文化和汉文化影响从而形成东南亚独特文化体的时期。故而双方的佛教交往，实际就成了我们要讨论的主题。这是一个前人基本没有认真做过的领域，仅从这一点上讲，本课题的学术意义也许可以说是在一个较新的领域进行的研究。

黎虎先生指出：“古代外交与现代外交的差别之一，就是前者为区域性的，后者世界性的。在近代意义上的世界性外交出现之前，古代世界的外交并非世界性的而是区域性的，即以几个文明发展最早的国家为中心形成若干区域性的外交圈；再以这些外交圈为中心不断辐射扩大，逐渐相互交叉重叠。”^② 宗教对7世纪之前中国与东南亚交往的影响，就非

① 童恩正：《南方——中华民族古文明的重要孕育之地》，成都，《南方民族考古》，第1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参见童恩正：《南方文明》，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年4月版，第2~3页。

② 黎虎：《汉唐外交制度史》，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6页。

常明显地符合这一定义。

这是在一个特殊时代、以一种特殊形式进行的交往。从两汉之际（或许更早）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佛教的影子便一直游荡于中国与东南亚交往的行为之中。随着佛教在中国传播及其信众群体的扩大，佛教很快成为中国与东南亚交往的主要内容。伴随着双方佛教的交往，一些相关或附带的交往行为也逐渐增多。特别是在六朝时期，佛教可以说已经明显地上升为中国与东南亚地区交往的主要动力和主要内容。这时期双方交往的性质也就由主题不甚突出的综合性，变成了明显的以佛教为主题了。强调宗教需求是公元7世纪之前中国与东南亚地区交往行为中最重要，也是最主要的动因，可以说是本课题较新的学术观点，至少前人没有如此系统地论述过。这也许可以算是本课题第二个具有学术价值的地方。

正如200多年前英国哲人大卫·休谟所说：“心灵是由低级向高级逐渐上升的：它通过对不完善之物进行抽象，从而形成一种关于完善的观念；同时，通过慢慢在其自身框架的粗俗部分中区分出更高贵的部分，它学会了只把更加崇高和高尚的后者移置到神身上。”^①中国古代族群对宗教的需求过程也是动态的、发展的。体现在公元7世纪之前中国与东南亚的交往上，自然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各个阶段的交往都有其特殊性。

基于这么一种基本观念，我们将该时期中国在东南亚地区宗教寻求行为分为两个大的阶段：一是汉魏时期，处于寻仙求异状态，集中表现在较为原始的宗教寻求行为上；二是两晋南北朝时期，先是逐渐向单一的佛教发展，终于在南朝时期形成了中国与东南亚间的第一次交往高潮。这在以前也是没有人详细做过的。或许可以算是本课题的第三个有学术

^① [英] 大卫·休谟：《宗教的自然史》（徐晓宏译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版，第3页。

价值的探讨。

在进行本课题讨论的过程中，不仅围绕着基本的理论问题较深入地讨论，而且在一些具体问题考证上，也做了许多工作，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虽然这些观点相对琐碎，而且不尽正确，但毕竟是通过努力研究得出的结论，这或许可以算是本课题主题之外所具有的学术价值吧。

程爱勤

2007 年 5 月 21 日

识于豫北·古牧野·闲斋



1

西汉时期南海中西航线之我见

要研究古代中国与东南亚的交往，不论是世俗的还是宗教的，《汉书·地理志下》中那段简要但翔实的南海航线史料是绝对不能忽略的。

其文曰：

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谿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资黄金杂增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①

^① [汉]班固：《汉书》卷二八《地理志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71页。

这段史料虽然文字不多，但给我们提供的信息却是非常详细且真实可信，其学术价值极高，影响也非常深远，已经成了近百年来学术界研究判断中国古代海上交通状态的必研史料，也是研究古代中国与东南亚以及通过东南亚与其他地区进行交往的必做功课。所以，虽然已经有许多学者大家写了许多卓越的文章，已经有了许多令人钦佩的成就，其间精辟可赞可叹，实堪吾辈治学之典范。以笔者之学识，断不敢言它。唯因诸多客观原因所限，使诸家对此史料的认识和论点多有矛盾，各执己见。而笔者要研究古代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宗教交往，又不得不从这里着手，故不揣学识浅陋，绞尽脑汁，苦思苦想，搜肠刮肚，斗胆命笔，虽不敢言废寝忘食，但确也是披星戴月而终成此文，得以以一孔之见，以就教方家。

一、都元国

藤田丰八先生认为，“都元国”即《通典》卷一八八所载之“都昆”，或《梁书》卷五四所载之“屈都昆”及《水经注》卷三六所载之“屈都乾”等之异译，并认为，其具体方位应在今苏门答腊岛的北岸，系“Kataha”一词的对音。^①

温雄飞先生认为，“都元国”即系“Touran”的对音，位于今越南的茶麟。^②

朱杰勤先生“把都元暂定为沱囊。沱囊在三国时代已是越南一个繁

① 藤田丰八：《前汉时代西南海上交通之记录》，《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何健民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32年版。

② 温雄飞：《南洋华侨通史》，上海，东方印书馆，1929年版，第17页。

盛地方。沱囊有一个海角，从海角就可以直入沱囊。^①

岑仲勉先生认为，“潭杨可为林阳，今克老地峡北有地名 Htayan，其即古之潭杨或林阳。……以行期计之，都元约居航程之半，国境似应在马来半岛。潭杨、都元，亦可为一音之转也”。^②

许云樵先生认为，“都元国”即“都昆”，地在加里曼丹岛，“都元”也就是杜黎美地理书上之“Satyrorum Ins”岛。^③

劳干先生认为，“都元”就在菲律宾境内。^④

韩振华先生认为，都元的方位应在今越南南圻滨海地区。^⑤

周连宽先生与张荣芳先生认为，“都元国”应位于马来半岛中南部的著名商港北大年。^⑥

沈福伟先生说：“都元在克拉地峡尖喷（春蓬）附近，南去万伦湾不远，离横越马来半岛的东西水道很近。”^⑦

章巽先生认为：“都元国在现在苏门答腊岛西北部八昔河（Pasei）的附近。”^⑧

藤田丰八、岑仲勉、许云樵、劳干、沈福伟、周连宽和张荣芳等先生的研究，主要是采取传统的对音考证方法，深厚的国学功底使他们的

① 朱杰勤：《汉代中国与东南亚和南亚海上交通线初探》，泉州，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海交史研究》，1983年，第3期。

② 岑仲勉：《南海昆仑与昆仑山最初译名及其附近诸国》，岑仲勉：《中外史地考证》，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

③ 许云樵：《古代南海航程中的地峡与地极》，新加坡，《南洋学报》，第5卷，第2辑，1948年12月。

④ 劳干：《论汉代之陆运与水运》，广州，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编辑委员会：《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47年，第16册。

⑤ 韩振华：《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一世纪间中国与印度东南亚的海上交通——汉书地理志粤地条末段考释》，厦门，《厦门大学学报》，1957年，第9辑。

⑥ 周连宽、张荣芳：《汉代我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海上交通和贸易关系》，北京，中华书局：《文史》，第9辑，1980年10月。

⑦ 沈福伟：《两汉三国时期的印度洋航业》，北京，中华书局：《文史》，第26辑，1986年5月。

⑧ 章巽：《我国古代的海上交通》，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9页。

研究显得游刃有余，其间论述多有精辟。但“考证外国古地名，不能光依靠对音方法。因为音有古今的不同，和地方语言的互异，而古今地名又有沿革，就有必要注意到它的方位、里数和历史条件”。^①尤其是在古代东南亚地区，由于客观历史发展的某种相似性，常常会出现一些惊人的雷同现象。我们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要在这一地区寻找出几个读音相近，甚或相同的地名，似乎并非太难。更何况，古音的对音考证，又是允许存在某种偏差的。

也许是某种“国粹主义”在作怪，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我国古代航海技术的水平往往给于过高的评价，仿佛在西汉时期，中国人已经能够自由自在地航行于浩瀚的海洋之上了。其实，古代中国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以大陆文化为中心的农业国，隋唐以前尤其如此。航海业（包括与之紧密相关的海上贸易）充其量仅仅是这种内陆型的封建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诸多副产品之一。直截了当地说，它对整个封建经济而言，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东西。在这种政治前提、经济前提以及与之相关联的诸种思想前提下，古代中国的航海业（包括海上贸易）自然也就不可能得到比较大的发展。关于这一点，学者们是有认识的。英国著名科学技术史专家、中国科学技术史权威人士李约瑟先生对中国航海发展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得出了十分中肯的观点。他认为，在公元350年左右，中国船只始航马来西亚的槟榔屿，4世纪末才到达锡兰，5世纪初到达幼发拉底河口。^②

在公元前后，航海技术还很落后，船只的续航能力还相当有限，加上人们海洋知识的极度贫乏，面对大海而产生的不可言状的恐惧心理等，

① 朱杰勤：《汉代中国与东南亚和南亚海上交通线初探》，泉州，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海交史研究》，1983年，第3期。

② 李约瑟：《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第一卷），转引自胡欣、丛淑媛：《印度洋纵横谈》，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页。